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0002

# “超越人类的叙事学”

## ——戴维·赫尔曼对“自我叙事”中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研究

宋杰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 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一直致力于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他在学术生涯后期将目光转至叙事文本中的动物, 着重考察故事世界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旨在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出发, 思考生态、环境、物种、家园、共同体等现实问题。为了说明叙事学如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本质和范围, 赫尔曼借助“自我叙事”的概念, 具体分析了短篇小说《上与下》中主人公是如何通过与动物产生交际, 继而融入它们的世界, 来建构“自我叙事”和使生成生物中心化成为可能。据此, 赫尔曼提出了“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的理念。其不仅符合当前叙事学领域在建构新理论上的发展趋势, 还表明叙事学本质上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 是一门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的学科。

**关键词:** 戴维·赫尔曼; 超越人类的叙事学; 自我叙事; 生成生物中心化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1-0121-08

##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David Herman’s Study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Self-Narratives”

SO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David Herman, a contemporary western cognitive narratologist,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narratology. In the later stage of his academic career, 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animals in narrative texts, focusing on th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storyworlds. His aim is to reflect on real-life issues such as ecology, environment, species, homeland and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ow narratology can inspire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Herman, with the concept of “self-narratives”, specifically analyzes how the protagonist in the short story *Above and Below* constructs “self-narratives” and enables biocentric becoming by interacting with animals and engaging in their worlds. Thus, Herman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constructing new theories in narratology,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narratology is based on social reality and is a discipline that is close to and reflects life.

**Keywords:** David Herman;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elf-narratives; biocentric becoming

---

收稿日期: 2025-07-27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戴维·赫尔曼‘作为认知风格’的叙事学研究”(25WWC004)

作者简介: 宋杰, 男, 江苏海门人, 南通大学校聘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认知诗学和认知叙事学。

美国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1962—）是后经典叙事学提出者和认知叙事学领军人物，一直研究如何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进行有机结合，开创了“作为认知风格的叙事”这样一种叙事学研究模式。纵观赫尔曼的学术研究生涯，其在学术研究的不同时期关注的焦点各有侧重，明显呈现出从经典叙事学研究倾向过渡到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倾向的特点。有一点毋庸置疑：赫尔曼始终秉持从认知的视角出发，去研究叙事学领域传统或新式的问题。正是如此，循着赫尔曼推出的众多著作和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大致把握他的认知叙事学研究脉络与流变：早期像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那样热衷于探讨叙事形式，继而在后经典意识的推动下从认知的视角重探叙事学的经典问题，最后摆脱桎梏建构出新颖的认知叙事学理论命题。

自21世纪初期赫尔曼走入国内学界视野后，学界对他的引介和研究工作也由此展开。在译介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他的著作，介绍了其人、其叙事学著作及其叙事学理论<sup>[1-3]</sup>。在他的叙事学著作引介上，尚必武与笔者分别向学界重点介绍过《叙事的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2009, 尚必武将书名译为《叙事的基本要件》）与《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 2018, 以下简称《超人类叙事学》）两本专著<sup>[4-5]</sup>。具体到他提出的叙事学理论概念和从事的认知叙事学个案研究上，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他提出的“多时性”（polychrony）概念、他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故事世界”（storyworlds）理念、他对叙事中“意向性”（intentionality）理论的重构和他对“序列”（sequences）的研究<sup>[6-9]</sup>。归根结底，国内这些或述介性或评论性的工作的着眼点都在于考察他对叙事形式的探究、对叙事学经典问题作出的新解或对叙事学理论的重构。赫尔曼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逐渐聚焦叙事文本中的动物世界、多物种故事世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等话题，试图通过研究动物叙事建构具有其本人研究特色的动物叙事学<sup>[10-12]</sup>。动物研究、后人类、生态等当下理论热点与叙事学研究的巧妙融合，反映出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最新的问题指向和理论发展方向。

但纵观国内外研究，鲜有学者关注并探讨他的这项兼具前沿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即使是国内一直致力于研究赫尔曼认知叙事学的笔者也并未过多触及该议题。笔者在此前评述《超人类叙事学》一书时指出，该书是对赫尔曼叙事学总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应将它置于赫尔曼的整个叙事学研究历程中加以考察；同样地，探讨赫尔曼的动物叙事研究也不应脱离赫尔曼总体学术研究的语境，因为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之前研究的接续和拓展，是对他之前就提出的理论主张的实践。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专门撰文介绍和评述他的这项研究，其有利于还原赫尔曼叙事学研究的整体性。

首先要说明的是，赫尔曼开展动物叙事研究符合新时期叙事学发展的内在要求，顺应了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当前的叙事学研究大致呈现以下两种趋势：一是叙事学家致力于建构新理论，从一开始视语言学为主要的理论借鉴资源，到后来通过吸收认知科学、生态批评、进化生物学、数字媒介研究、女性主义文论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宝贵经验，叙事学家努力搭建新的理论框架，实现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二是叙事学家不断扩大研究的故事语料范围，拓宽故事讲述媒介的视域，让叙事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以书面文字呈现的文学文本，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让叙事学研究变得饶有趣味。赫尔曼认为，除以上两个趋势外，21世纪的叙事学面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本质上是反身性的，也是对元叙事学的回应。具体而言，它要求叙事学在一个更宽阔的研究生态系统中或一个更宏观的价值系统中重新评估自身的研究，考虑分析故事的方式是如何与社会规范、制度以及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规范、制度以及实践与当前人类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涉及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法律法规等。他的动物叙事研究正是对当前学术语境和社会焦点的能动反映，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般而言，“动物叙事”可泛指所有主题与动物相关的叙事文本或叙事内容，但这个意义上的“动物叙事”是一种广义叙事现象，而非具体研究领域。以此类推，“动物叙事研究”似乎可指涉任何有关叙事文本中动物的研究。为了区别于这类研究，赫尔曼就以“生物叙事学”“动

物叙事学”“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等类似术语来界定他对叙事文本中动物，确切说是非人类动物的研究。可见，他似乎并未严格定义他从事的这项研究，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亟待厘清。

笔者拟于下文介绍赫尔曼学术生涯后期针对非人类动物所作的研究，以尽可能向学界展现其叙事学研究中未被重视的话题，彰显其叙事学研究的多面性。由于他的相关著述颇多，且囿于篇幅，本文仅从他提出的“超越人类的叙事学”这一概念出发，论述他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自我叙事。在此基础上，以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的短篇小说《上与下》（*Above and Below*, 2011）为例，阐释小说主人公是如何将自己融入非人类动物的世界来建构自我叙事，进而再现小说对生成生物中心化的刻画。可以说，《上与下》描写的是主人公对自我叙事的建构，而它本身也是一篇自我叙事。

## 一、“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之理论基础： “自我叙事”

赫尔曼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主要受美国心理学家肯尼斯·J. 格根（Kenneth J. Gergen）与玛丽·M. 格根（Mary M. Gergen）的“自我叙事”概念的影响和启发。二人认为自我叙事在心理、交际、社会文化层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自我叙事的产生源于人们想要“在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sup>[13][162]</sup>。虽然自我叙事为个体所有，但它的产生源于社会，也需要通过社交维持，这种叙事最终会成为“服务于辩护、批评与社会团结这样的社会目标的符号系统”<sup>[13][163]</sup>。当个体行为得到社会认可后，个体亟需阐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隐秘叙事线，从而达到让个体行为变得容易理解和为人接受的目的。二人将自我叙事视为人类在交际时用于意义建构的有效资源，以及用于支撑、促进或阻碍行为发生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二人进一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自我叙事：稳定叙事、进步叙事、退步叙事。稳定叙事体现出人们的共同愿望，即希望社会和世界变得有秩序并朝着大家可预测的方向发展；进步叙事让人们有机会看到自身与周遭环境在不断往好的方向发展；退步叙事与进步叙事相反，

它的基调虽是消极否定的，但反过来有激励他人的功能。

赫尔曼认为，自我叙事能证明虚构和非虚构叙事是如何与不同本体的比较研究产生联系的；这些本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时代。换言之，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紧密相关。通过扩大可能世界和文本世界理论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叙事学研究者不仅能建构出与单个文本或某种文类相关的故事世界本体，还能建构出容纳这些文本和文类的文化本体。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世界到底由何种生物组成？这些物种身上能体现哪些特质和能力？再者，处于不同类别和子类别的物种是如何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不存在一个能在自然与文化、物体与人类之间作出严格区分的现代性本体论，也不存在一个围绕人类行为主体和非人类行为主体建构出的现代性本体论<sup>[14]</sup>。拉图尔尝试弱化动物与其他非人类行为主体间的区别，而其他学者则尤为关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了不同本体论是如何跨越种系边界，赋予不同物种自我身份的可能性。巴西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通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身上体现出的本体论，指出“世界上居住着不同种类的主体和族群，不同种类的人类和非人类，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现实”<sup>[15][469]</sup>。据此，他提出“宇宙哲学指示论”概念，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不会将人类称为自然物种，他们说的话“指涉人格的社会状况，（若不在句法层面则在语用层面）更多地起到代词而非名词的作用。它们表明主体的位置；它们不是发音的标志，也不是名称……美洲印第安人的灵魂，无论是具有人类还是动物属性，都属于指示范畴……美洲印第安人的本体论视角主义是沿着‘视角创造主体’这种观点成形的；只要被这一观点直接启发或‘由其作为中介’启发后生成的，无论什么都可能被称为主体”<sup>[15][476-477]</sup>。

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同样研究过自我和主体性的问题，他致力于发展出一个不再局限于聚焦人类是如何描述和再现动物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转而关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日常交际以及这些交际具备何种新的

可能性。他认为，“并不仅仅是人类，世间万物都会以自我身份，与世界、与他人他物产生交际，也就是作为拥有观点的生物存在”<sup>[16]</sup>。进一步讲，如果以超越人类的视角看待世界或以超越人类的方式体验世界，人类就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自我。如此，只有当“自我”的概念被置于更广泛的“自我生态学”<sup>[17]</sup>的视域中，其真正内涵才能凸显。同样地，当叙事用于将自我的体验与交际进程建构的故事线结合在一起时，它也应被置于“自我生态学”的视域中来考察。

## 二、“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之批评实践： 《上与下》中的生成生物中心化

赫尔曼指出，《上与下》中主人公的叙事不仅具有过时自我叙事的特征，同时也兼具一个难以被人想象出来的故事线。由此，他借助拉图尔的观点，指出这部作品“戏剧性地表现出主人公从一个受限的自我生态系统转移至另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自我生态系统，暴露出在向超越人类的自我分配可能性时，是分配足够多的可能性还是分配极少的可能性，这二者之间存在断层线”<sup>[18][136]</sup>。他所说的“断层线”其实也存在于用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看世界和用生物中心主义视角看世界之间。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有人通过等级制，在人类和其他物种间作出严格区分；二是有人认为无法严格区分人类和非人类，二者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这部小说就在两端游走：它既见证了主人公建构自我叙事愿望的落空，也体现了其在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中对自我身份和地位的认知在不断强化。如此看来，这个短篇故事通过“人格”的概念追溯了物种的变异。“人格”的产生源于抵制自我的人类中心地理学，因为这种人类中心地理学将人类置于其他形式生物之上，但将人类体验置于靠人类假想出来的其他形式生物的体验之下。主人公不断续续与动物产生交集，这打乱了她从一个极为受限的本体中挣脱出来的节奏。这个本体削弱了她与大量他者产生联系的能力，从而暗示在一个不断扩大和延伸的自我生态系统中实现“生成生物中心化”的可能。

《上与下》的主人公在过去就擅长处理与他人的交际关系，能基于当前立场理解过去的一言一行，还能憧憬未来。主人公将她此时此刻的生活

与往事、支离破碎的生态群落、陈旧过时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让自身融入另一个更宽广的生态群落。叙事进而拥有新的载体，让故事情节朝着新方向发展。赫尔曼认为，这种被扩大的自我生态系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并重构“关系性”的概念，因为它说明转向一个让“人格”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本体会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这一本体中，他者包括非人类物种；这些物种都能从某个特定视角去体验世界，人类则在与这些物种的“对话”过程中让自己的自我叙事成形，并借此描述这些物种。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从一个被人遗弃的生态群落向一个重塑的、集体的、跨种系的生态群落的转移经历，动物在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小说反映出一个动态的转移过程：主人公一开始身处自卫的、反抗的自我叙事，接着从中挣脱，朝着一个新的关于自我的故事走去；在新故事中，作为活生生物种的个人是他者中一员，具备生成生物中心化的无限可能。这种叙事结构强调，想从一个为人熟悉的本体中抽离出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抽离出来后，想要再回到这个本体中去，也绝非易事。

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主人公有时会公开承认她在自我生态系统中的身份地位，有时又会矢口否认这一身份地位。例如，当她在离开公寓前收拾露营装备时，这些装备让她想到自己与前男友在佛罗里达州露营的时光，当时二人“被雄性鳄鱼的吼叫吓呆了”<sup>[19][106]</sup>。当主人公提及往事时，她正好摆脱堆积如山的债务，就像文本中反复提到的蛇那样，从山的“底部爬行出来”<sup>[19][106]</sup>。这里使用的动物隐喻由主人公提及，并非叙述者强加在主人公身上的。主人公对自我身份地位的否认出现在她偶遇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时，这是她加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团体的第一步。这个团体由被边缘化、被剥夺权利、不被大众关注的人组成。这里的居民依靠集体挣来的钱支付水电费，通过卖掉捡拾来的废旧物品换钱购买食物。主人公与他们居住在一起，建立起关系网，再一次与他者结为同盟。这一场景不由得让读者联想到小说中学生从宿舍搬出，偷偷溜去校园找食物的画面：“她感觉就像一只老鼠穿行在校园中，从一个阴暗处跑到另一个阴暗处。就好像她认识的人能看到她、闻到她的气味一样。”<sup>[19][117]</sup>

小说中还有一处可说明这一问题：当主人公抵达草原住宅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全新的自我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她仔细地擦洗着厨房。她打扫卫生的习惯贯穿叙事文本始末，这一行为似乎暗示她想要书写一个全新的有关自我的故事。当主人公在草原住宅这一新的场所安定下来后，她开始走入这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不同物种的边界可以被消除，物种的类别甚至也能被改变。正是如此，物种极有可能为自身赋予人格，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多种多样，这都能重构主人公的自我叙事。“有一晚，其他居民集聚在篝火旁，共同庆祝圣诞节，主人公也从家中走出，走入附近的人群。每走一步，对她而言，都像是从酒醉的叫喊声中解脱一般，火堆里的纸屑燃烧着，像飞蛾一般旋转飞舞着，火焰让人感到灼热。越过第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丘，黑暗拥有了自己的光芒，她开始辨别地面的纹理。”<sup>[19][18-119]</sup>随着世界不断扩大，它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主人公面前，她在其中的位置也逐渐清晰，为生成生物中心化提供可能。例如，故事是这么描述的：“她缓缓地从沙石凹陷处迈过，棕榈刺痛她的小腿，沼泽突然很奇怪地散开。细小的事物伴随她的脚步沙沙作响，它们如此微小又害怕危险的来临，对于它们，主人公只能温柔以待。”<sup>[19][119]</sup>又如，还有一段描述同样具有这种功能：“她能闻到排水沟的腐臭味，这个排水沟还是一些好心但游手好闲的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贯穿整个草原挖掘的。靠双手的辛勤劳作，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让这片土地重获新生。她想到蛇在洞穴里盘绕着入了眠，鳄鱼觉察到黑暗中的她然后浮出水面，一摇一摆上了岸，肚子慢慢变大；她只是众多他者里的一个迷途者，并没有因为是人类而有何特殊之处。”<sup>[19][119]</sup>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物种能够联系在一起，人类并不一定比其他物种优越，同样为生成生物中心化提供可能。排水沟的修建到最后是徒劳的，其预示着一个内部充满不可预测的物种变形和计划之外的群体数量增长的世界在逐渐成形，这就让人类无法在一片时刻充满物种变异的土地上建立稳固不变的地位。

主人公在故事结尾开始试图向读者阐释重新建构的自我叙事，但格罗夫通过使用省略号以及故意加快叙事进程的做法来妨碍甚至是阻止读者

走入这个新的自我叙事。这个新叙事文本的叙事线是指示性的，它体现出当一个具有宽泛意义的本体向一个容纳范畴较为局限的本体过渡，以及使用超人类意义上的术语来重构“关系性”的概念时，其暗示着只能建构一个情节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的有关自我的新故事，而不是一个从开头就能被设想出结局的新故事。《上与下》的最后一部分一下子跳至几年后，讲述了主人公在生孩子时的痛苦经历。就在她接受分娩手术时，故事情节又回到庆祝圣诞节的那晚，描述了主人公在意识到自己是草原中的一只动物后，感到非常恐慌。故事并未描述介于庆祝圣诞节那晚和主人公分娩那天之间的时光，也未说明主人公通过何种叙事载体来理解这一期间未被公之于众的事件与经历，但正如赫尔曼对故事结局作出的评论一样：“无论这个新故事的细节是关于谁的以及主人公又是何人，她不断在建构中的叙事已经为生成生物中心化提供了新的可能，生成生物中心化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自我生态系统中。”<sup>[18][140]</sup>故事结尾写道：“医生的手进入她的肉体，她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口，她女儿的小拳头向空中伸去。”<sup>[19][119]</sup>这表明主人公在努力思考人类群体中的关系联结，她显然倾向于将自身置于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面向所有人类与非人类他者，与他们建立起多种多样的联系。故事结尾有一处意味深长：主人公看着病房角落的圣诞红，她意识到自己在思考花盆的黑泥土里到底有何物。此时此刻，她已经完全和周围的非人类他者融入一个世界。可以说，主人公在小说始末一直处于建构自我叙事的过程中，她对自己在生物圈中地位的认知也不断增强，当她意识到人类与非人类他者实为命运共同体后，她努力建构并不断重构的自我叙事实际上就是赫尔曼所说的“超越人类的叙事”。

格罗夫的《上与下》展现了对现代性文化中本体论的抵制。这一叙事文本有一点极具讽刺意味，那就是主人公再次获得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格这一结果，是通过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众多他者里的一个迷途者这样的途径达到的，拥有这种人格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人公自我叙事的建构。因此，尽管一个意义较为局限的本体能赋予其中仅有的极少数个体足够大的权力和足够多的选择来建构自我身份；但在一个意义更为宽泛的本体中，由

于它将人格赋予不同形式的生命体，这个本体让主人公在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中重新获得主体性。这个世界没有等级森严的“上”与“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内部所有不同物种都平等的自我生态系统。简言之，《上与下》证明：“最能被维持下去的自我就是那些最不强调自身主权地位的自我。”<sup>[18][14]</sup>《上与下》的故事情节还迎合了生物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表明个体要想获得健康幸福、文化得以繁荣昌盛，人类就必须承认自己只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并且对生态系统负有一定责任；人类需要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因为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依赖于生态系统。《上与下》这部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因为作者通过作品想要揭示的恰恰是生态系统中万物平等的本质。在他看来，不同物种在等级上没有所谓的“上与下”。

### 三、“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之学术价值： 推动叙事学跨学科研究

赫尔曼认为，“虚构作品不仅为呈现自我叙事的瓦解和重构提供平台，还为探索那些能让自我身份被识别的本体提供可能”<sup>[18][14]</sup>。他强调重构关系性模式的必要性，一是因为它会影响自我叙事的实践操作，二是因为它本身就源于自我叙事的实践操作。建构出的关系性模式既具有生态学意义，也是社会性的：之所以具有生态学意义，是因为人类形成自我身份就在一个融自身与非人类于一体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之所以又是社会性的，是因为人类会与周围的人组成社群或与非人类结成联盟。若将视域接着拓宽，人类学、文化心理学、文学叙事等研究领域内的方法也可以被用来解读《上与下》这样的自我叙事，有关动物、有关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叙事能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反过来看亦是如此，以跨学科的方法解读这些叙事能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并在实际生活中用行动实践这些新的思想理念。赫尔曼认为，未来的叙事学研究应将足够多主题涉及跨物种的虚构和非虚构叙事作品纳入考察范畴，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在自我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赫尔曼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概念，旨在说明叙事学研究到底能否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人

类与动物关系的本质属性和涵盖范围。他借助“自我叙事”的概念，通过具体的小说文本来探讨其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说明人类始终在不断建构自我叙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自我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自我与动物关系的认知得到强化，真正意识到人类与动物是命运共同体。其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这项研究体现了他对当代叙事学发展趋势和最新潮流的响应。他不再局限于研究叙事形式和叙事技巧，转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来充实叙事学理论和叙事学研究的内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彰显了他虽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却始终关注生态、环境、物种、家园、共同体等全球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思考和及时回应，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的这项研究还不够成熟，存在可供商榷和探讨之处。首先，“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具备指导叙事阐释的能力。无论是具体的叙事学理论还是宽泛意义上的叙事学概念，它们最终还是应该服务于文学批评。他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目的是说明叙事学家也能为解答社会现实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更具体地说，他想要阐明“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有助于建构新的且更能持续发展的、为个体和集体所有的自我叙事，这些自我叙事将自我置于更广阔的生物活动网络”<sup>[18][13]</sup>。可见，他本来无意，至少是没有过多将重点放在“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是如何指导叙事文本阐释上。虽然在研究过程中，他特意选择了短篇小说《上与下》作为分析问题的案例，但其目的是通过故事情节来揭示、继而证实自己的观点，而非通过文本说明概念的学理价值。

其次，“超越人类的叙事学”这一概念提出的合理性和普适性还有待考证。如上文所述，赫尔曼在学术生涯后期转向研究叙事文本中的动物时，使用过“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生物叙事学”“动物叙事学”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他于2018推出《超人类叙事学》一书<sup>[20]</sup>。该书集中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系统、深入的思考，但在书中，他也未对相关术语和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各种不同概念在书的不同部分出现，在具体应用时也未进行有效区

分。因此，“超越人类的叙事学”这一概念是否可以完全涵盖其动物叙事研究，以及是否可以用这一概念观照任何涉及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叙事文本，还有待验证。

最后，“超越人类的叙事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指向性不够鲜明，这极大地弱化了它被视为叙事学分支之一的可能性。赫尔曼曾试图建构动物叙事学，他在理论层面指出详细具体的建构方案和在实践层面开展切实可行的文本批评：在理论建构上，他提出动物叙事学的研究媒介为动物连环画，研究对象为非人类心智，研究落脚点是对（动物连环画的）叙事性的回应；在批评实践上，他主要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别考察动物连环画中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边界，指出这种边界并非清晰可见而是难以区分的<sup>[21]</sup>。但在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时，他仅基于“自我叙事”的概念，分析了一部算得上是“自我叙事”的短篇小说，以此说明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是平等的，二者间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发展状态，可以被解构和重构。不过，研究过程并未体现他到底提出了何种具体的理论主张，文本批评得出的结论与他的其他动物叙事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都没有太强的独到性。有意思的是，他2018年推出的专著的主标题就使用了“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笔者在书评和后续发表的论文中，都将书的主标题译为《超人类叙事学》，也阐释过选择该译法的原因<sup>[22]</sup>），足见他为建构叙事学新分支作出的努力。但纵观全书可以发现，该书主要还是由他之前发表的系列论文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想要通过该书建构的“超越人类的叙事学”在逻辑上比较松散，不够严密，这也是为何笔者在本文中并未认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是他建构的一个新领域，而是将其视为他提出的一个概念。

赫尔曼提出的“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是他在新时期叙事学纵深发展的学术背景下，结合现实热点议题，为进一步推动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作出的尝试和努力。其本身虽未建构新的理论模型或对叙事实践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体现出他始终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的态度和深耕细耘的精神。作为当代叙事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在动物叙事上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笔者外，

国内还暂未有人对他的这项研究进行过系统的介绍和研究。笔者认为，应辩证地看待其“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学者去关注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尽可能还原赫尔曼（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整体性。

### 参考文献：

- [1] 戴卫·赫尔曼. 新叙事学 [M]. 马海良,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戴维·赫尔曼. 自然语言叙事中的空间认知 [J]. 杨莉, 译. 江西社会科学, 2009(1): 37-41.
- [3] 戴维·赫尔曼. 故事、媒介与心智: 通过文字与图像完成的叙事世界建构 [M]// 宋杰, 译. 支宇. 认知诗学: 第12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2: 111-125.
- [4] 尚必武. 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 论赫尔曼《叙事的基本要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4(1): 85-91.
- [5] 宋杰. 构建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 评戴维·赫尔曼的《超人类叙事学: 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1(5): 143-151.
- [6] 尚广辉.“模糊时间性”: 论戴维·赫尔曼的“多时性”叙事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9, 30(5): 57-66, 76, 158.
- [7] 尚广辉. 叙事的“心理模型”: 论戴维·赫尔曼的“故事世界”叙事理论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4, 35(3): 71-81.
- [8] 宋杰. 戴维·赫尔曼论“意向性”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4): 57-68.
- [9] 宋杰. 序列: 脚本与故事的界面: 戴维·赫尔曼的序列研究 [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05-112.
- [10] HERMAN D. Storyworld/Umwelt: Nonhuman Experiences in Graphic Narratives[J]. SubStance, 2011, 40(1): 156-181.
- [11] HERMAN D. Animal Worlds in Modern Fiction: An Introduction[J].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14, 60(3): 421-443.
- [12] HERMAN D. Hermeneutics Beyond the Species Boundary: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Animal Narratives[J].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2016, 8(1): 1-30.
- [13] GERGEN K J, GERGEN M M. Narratives of the Self[M]// HINCHMAN L P, HINCHMAN S K.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161-184.
- [14]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CATHERINE P, Translat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12.

- [15] VIVEIROS DE CASTRO E. 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98, 4(3): 469–488.
- [16] KOHN E.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32.
- [17] KOHN E. *How Dogs Dream: Amazonian Na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species Engagement*[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7, 34(1): 4.
- [18] HERMAN D.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J]. *DIEGESIS*, 2014, 3(2): 131–143.
- [19] GROFF L. *Above and Below*[J]. *The New Yorker*, 2011 (June 6–13): 106–119.
- [20] HERMAN D.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1] HERMAN D. *Toward a Zoonarratology: Storytelling and Species Difference in Animal Comics*[M]//LEHTIMÄKI M, KARTTUNEN L, MÄKELÄ M. *Narrative, Interrupted: The Plotless, the Disturbing and the Trivial in Litera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93–119.
- [22] 宋杰. 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以赫尔曼独撰的5本专著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3): 298.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120页)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EB/OL]. [2025-06-25]. [http://www.news.cn/politics/zwyj/2022-08/16/c\\_1128920613.htm](http://www.news.cn/politics/zwyj/2022-08/16/c_1128920613.htm)
- [4] 谭必友. 田野中国学研究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3: 112–123.
- [5] 谭必友. 田野规划能否为业：田野规划线上学术沙龙纪要 [EB/OL]. [2025-06-25]. <https://mzx.hunnu.edu.cn/info/1082/1642.htm>.
- [6] 朱季康. 反思、应对、建构：对区域文化研究、宣传与发扬的思考：以吴文化、淮扬文化为例 [J]. 地域文化研究, 2019(3): 1–6, 153.
- [7] 文革, 李银兵. 从描述、解释到批判：嬗变中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J]. 思想战线, 2009, 35(3): 13–16.
- [8] 刘宇, 伍丹炜, 叶继元. 文本可读性与学术论文的影响力：基于图书情报学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5): 111–127.
- [9] 谭必友. 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煜传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2.
- [10] 魏源. 魏源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348.
- [11]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七 [M]. 长沙：湖南图书馆，

来鹿堂藏板，道光庚寅仲夏月重镌，1830: 六十四页B-六十六页B.

- [12] 费孝通. 费孝通全集：第1卷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13] 周作人. 现代散文导论：上 [M]//鲁迅, 茅盾, 周作人, 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40: 179–198.
- [14] 朱自清. 什么是文学 [M]//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 台湾：文化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273.
- [15] 郁达夫. 现代散文导论：下 [M]//鲁迅, 茅盾, 周作人, 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40: 199–212.
- [16] 丁亚平. 文化散文论 [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3): 75–86.
- [17] 郝原. 文学散文的审视与界定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33(6): 159–162.
- [18] 汤溢泽. 《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 [J]. 文学自由谈, 1996(2): 19–25.
- [19] 龚晓雅. 论贾平凹地域文化散文创作 [J]. 汉字文化, 2022(23): 140–142.

责任编辑：黄声波